



林少华近照

多年前,在谈及译介事业的状况时,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用了“欣欣向荣,问题多多”8个字。如今,尽管翻译作品这块“蛋糕”在出版市场越做越大,但林少华对其评价依然没有改变。

让这位翻译家感到担忧的是,老一辈翻译家逐渐退出的同时,青年一代并没有挑起大梁,翻译界的青黄不接现象已经显现。他不由得感慨:“好作品不是没有,但有点可遇不可求。”

4月1日,林少华先生在青岛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专访,他特别强调,好的文学翻译作品,对提高人的审美眼光有独特的作用,不应该被忽视。

“欣欣向荣,问题多多”—— 林少华:好的译作 可以提高审美眼光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翻译现状欣欣向荣,问题多多

齐鲁晚报:您几年前曾说过我国的翻译现状是“欣欣向荣,问题多多”,不知道这句话现在是否适用?

林少华:翻译作品大概占我们出版市场的30%到40%,对出版社来说,翻译作品是块“大蛋糕”,质量参差不齐固然存在,但就翻译队伍的数量来说是相当可观的,在这个意义上,不妨称之为欣欣向荣。翻译参差不齐,的确是这样,青黄不接,像傅惟慈这样的老一辈人,有的去世了,即使健在的也拿不动笔了。中间的就是我这个年龄的,

“文革”期间上初中、高中,正在读书的时候无书可读,所受的教育不完整,知识结构也不完整,和我一起搞日本文学翻译的本来也有十个八个,但后来经过下海热、出国热、当官热的“三股浪潮”,即使本来有才华搞的,也经不起这些诱惑,改弦易辙了。

新补充进来的所谓的生力军,四五十岁、二三十岁的,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和我们不一样,我们那时候固然因为无书可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但他们这代人有书可

读,但没有兴趣读了。文字需要日积月累、耳濡目染,如果没有这种积累,即使天才也不行,说白了,需要下死工夫。新进入翻译队伍的年纪较小的人有这样的先天不足,所以就导致大家现在读到的翻译作品不够理想,好的不是没有,但是可遇不可求。这一代人的优势是外语水平好,但母语弱一些。外语能力好可以保证不出错,保证语法、语汇、句子的正确,但文学的翻译不仅仅是句子正确的事情,要把味道翻译出来。

翻译人才被漠视危害很大

齐鲁晚报:您如果读到不好的译著是什么感觉?您本人有没有比较推崇的翻译家?

林少华:我搞翻译,但我读的译作不多,文字有传染性,碰到不好的文体,即使你怀着警觉、戒心去读,也会影响自己翻译的笔调和文体的纯度。就日本文学来说,丰子恺的翻译还是耐读的,比如他翻译的《源氏物语》。本来他就不是专做翻译的,翻译是偶尔为之。丰子恺年谱上有一句话叫“金尽回国”,在日本呆了不到一年,他的日语有多么深厚?客观来说

不大可能,可是他对文字的感觉、整体审美气氛的传达很好。文学的认识功能、教育功能都可以由其他学科代替,但审美功能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。之前,因为“文革”,我们对审美的功能强调不够,但其实审美才是文学无可取代的功能。

齐鲁晚报:前段时间,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君伟撰文说“翻译近乎勇”,谈到现在翻译家的不受重视、不被承认,这是否也在客观上影响了译介事业的发展?

林少华:造成翻译的这种状况,

除了翻译家本人学养准备不够、艺术悟性不到位之外,还有一个环境问题,就像我们常说的稿费低。翻译是高手不愿意干,耍手干不了,稿费低,高手肯定不干。此外,在大学、科研机构,文学翻译不被作为正儿八经的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。呼吁改革的声音不少,但改变不大。我除了做翻译,也搞学术和创作,你不评价就不评价,不评价翻译,我还有学术,到我这个年龄,评价不评价无所谓。但是对年轻人,评价就是导向,不评价,高手肯定不干,先要写论文,拿课题项目。

名著重译成风是利之所趋

齐鲁晚报:现在的出版社热衷于推出名著重译、改译,但不少读者还是愿意看老版的名家译本,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

林少华:外国名著都开放版权了,作者去世超过五十年,不用向外国人支付版税,只给译者支付稿酬,而译者稿酬又比较低,所以牟利空间比较大。既然是名著,那肯定人所

共知,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做,只要找到译者,甚至没有译者,七拼八凑也可以弄出来。根本原因是出版社的一种趋利行为,其结果必然是参差不齐,人们更愿意看老的译本,像丰子恺、王道乾、查良铮、汝龙等。老一辈翻译家的语言功底、艺术悟性都很好,而且有责任心,一丝不苟的态度是当代人无法相比的。

齐鲁晚报:您之前也强调过,翻译家要有社会责任心。

林少华:至少要有一种专业意识,有些翻译家我本来是很佩服的,但后来他的影响没达到他应该有的高度,就是因为有一点名气后就马虎了,反正有出版社向我约稿,又催得急,就赶快交稿算了。文字是要给人看的,人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。

村上春树在中国走红属于“乘虚而入”

齐鲁晚报:对您来说,翻译有没有特别痛苦的经历?

林少华:那肯定是快乐与痛苦交替的,痛并快乐着。从我的翻译体验看,翻译村上春树快乐的时候多,翻译川端康成就是痛苦的时候多。村上春树的文体,甚至他所追求的价值观,和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拍的,尤其其他的文体简洁。日本作家的文字拖泥带水的多,欲言又止,而村上春树是相反的,简洁、明快、利索、干脆,这一点和我的笔调有不谋而合的地方,所以翻译起来有得心应手的感觉,甚至翻译到一定程度会觉得是在倾诉,而不是在翻译他的东西,就很快乐。川端康成就不同了,他是传统的日本语言风格,很含蓄,含蓄的东西咱中国人也讲,但他的追求有点过头。另外,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我也

不喜欢,他倒不是文字上的,主要是审美错位,那种感觉、价值观我接受不了,那种走火入魔的美学意识、文体风格过分了。翻译这两个人的作品,痛苦远远大于快乐。任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,翻译家也有他的局限性,有适合你的,有不适合你的,就跟谈恋爱一样,世界上的女士多了,但谈得来的、一见钟情的还是有限。

齐鲁晚报:村上春树的书到了中国后为什么成了所谓“小资”的标配,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?

林少华:他毕竟提供了一种生活情调,这种情调不仅仅是在酒吧喝喝酒,更多的是一种心灵感受。小资现在不怎么提了,10年前提得比较多,而且往往是贬义的,在我看来那是一种进步。在我们中国,人们内心世界的风景比较荒

凉,至少是粗线条的,而村上提供的层次,让人们内心变得细腻起来,注重审美,注重对日常风景的独特感受,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走红,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点。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,我们的文学作品写都市生活的都是描写消费、欲望,村上一般不谈这个,而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,这与日本城市化进程比我们早有关。我觉得,村上春树在中国走红实际也是乘虚而入,我们城市化进程晚,但我们都市里青年男女的思想是超前的,我们的城市化还没完成的时候,城市的小资已经是后现代了。村上春树正是打时间差进来的,是对我们城市青年人内心的一种补充,他们想表达的东西,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,村上替他们说出来了。

【同题问答】

齐鲁晚报:您正在看的书有哪些?

林少华:我现在完全为了读书而读书的时间不多了,就兴趣而言,我还是喜欢看禅宗方面的,比如文人情趣的禅宗或者诗歌里的禅宗意象。这可能和我的年纪有关,对于生死,你们这个年纪不会考虑,我们这个年纪就需要找个出口,找个解释,往往就走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了。我又有古文人趣味,还是喜欢唐诗宋词,慢慢地品味,喝一杯茶在那儿反复地看,喜欢看这类东西,也不会花很多时间。我作为“文革”这代人,知识结构不完整,搞外国文学不懂圣经、古希腊悲剧,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其实是不够的,而我恰恰一直没有时间看,包括中国的四书五经。有机会我还是想看看这些书,半是出于兴趣,半是出于需要。

齐鲁晚报: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什么?

林少华:说起影响比较深的,我想还是小时候看过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有人评价《三国演义》的负面角度比较多,总说一些阴谋诡计之类。我个人阅读不是从这方面,我觉得它的核心是“义”,这是一种契约精神,一旦许诺,终身相随,这也是现代社会所缺少的。后来影响比较大的是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。一般人不会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,但这两本书里面的风骨和信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。这本书讲究洁身自好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,强调一种担当。桀骜不驯我觉得说大了,但至少我不同流合污,不会落井下石,起码做到洁身自好,这是底线。